

孙犁全集（第6集）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《澹定集》、《尺泽集》。

《澹定集》

1981年10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；

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。

《尺泽集》

1982年12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；

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。

澹 定 集

答吴泰昌问

问：请谈谈生养您的环境和经历，是否有效地促使您成为一名作家，并在您的创作上留下怎样的印记？

答：你从我写的自传和一些回忆散文中，可以知道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少年经历，都是很平凡的。有一段时间，虽也有志于文学，但所得实在有限，不足以一口，所以知难而退，到乡村教书去了。但是，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始，我经历了我们国家不同寻常的时代，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我有幸当一名不太出色的战士和作家。这一时代，在我微薄的作品收获中，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。

问：“当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”——这个题目您有兴趣谈谈吗？

答：我写的第一篇小说，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《育德月报》上，时间大概是一九二九年。那确实是一篇小说，因为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，他对文体要求很严，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，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，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，这一篇是散文，不好用。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，内容记得是写一

家盲人的不幸。我的作品,从同情和怜悯开始,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。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,也是写她的不幸的。

问:您在《文学和生活的路》一文中说,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,如果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抽掉,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请您更详细具体地说说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,您理解的人道主义包含哪些具体内容,您是否认为有一种普遍的属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?

答:所谓人性、人道,对于人类来说,应当是泛指,是一种共性。人道主义,是一种广泛的道德观念,它是人类生活,人类文明,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人类,由于共同生活的必需,产生和发展它的道德、伦理观念。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长久实施,以及牢固地存在于人类头脑之中,似乎可以形成一种有遗传能力的“染色体”。即使是幼小的孩童,从他们对善恶的判断和反应之中,可以看出这种观念的先天性。人道观念和其他道德观念一样,可以因后天的环境、教育,外界影响,得到丰富、加强,发扬光大;反之,也可以遭到破坏,减损,甚至消失。中国古代哲学家,从人类的进化和完善着眼,一贯把性善作为人的本性,肯定地提出。

事实是,决定人类道德观念的,是人类的社会组织、经济生活、政治宗教、法制教育。经济生活占其中主导地位。经济生活的破产,常常使道德沦丧。此外,异族统治、社会动乱、反动政治,也可以使道德低落。经济生活的富裕,文化教育的提高,则可以提高人类的道德。当然,这只是就其

大体而言。道德之演进,如大江之行,回旋起伏,变化万端,激浊扬清,终归于进步。如异族统治,固使一部分人道德下降,但也激励另一部分人,使之上升。

文学艺术,除去给人美的感受外,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,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。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,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,发扬一种理想,所以说,凡是伟大的作家,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。例如《红楼梦》,就是一部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品。它的主题,就是批判人性、解放人性,发扬人性之美。详见我写的《〈红楼梦〉杂说》。

问:文学与自传的关系历来看法不一,很想听听您的意见?

答:当然,有很多文学作品,含有作者自传的性质,但不能说,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。作家创作方法的不同,也能区别自传成分的多寡。

我的作品单薄,自传的成分多。

问:孙犁派(或叫荷花淀派)是公认的我国当代文学园地里一个有影响、有成就的文学流派,河北、天津一带许多作者的创作受您的影响,有意学习甚至模仿您的风格,但成功的似乎不多,这是为什么?请您顺此谈谈风格流派形成的要素与学习、创新等问题。

答:记者同志,你知道,我不会狂妄到,以我那么浅薄的作品,这么一点点成就,就大言不惭地承认有了一个什么派。我一贯是反对“派性”的,当然这是学术。一些热情的

同行们,愿意活跃一下学术空气,愿意爱好相同的同志们聚在一起热闹热闹。确实,我们冷清了很多年,也应该热闹热闹了。

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心情,我是理解的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,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,我则极力制止过。现在情况不同了,我不愿给同志们泼冷水。但是,以我看,这个所谓流派,至少是目前还没有形成。将来能不能形成?我看希望也不会很大的。

在中国的文学史上,以某一个人形成一个流派的史实很少。即使像李白、杜甫那样名垂千古的大作家,在当时也没有流派之说。唐诗无流派,而名家辈出,风格多样,诗坛繁荣。散文方面,唐宋八家,也是各自为战,未立门墙。“五四”以后,鲁迅先生及其他几位大作家,在文坛上,都是星斗悬天,风靡一代,也没听说哪一个曾有流派产生。虽也有时集会结社,但多为期不长,即行分化。在文学史上,当然有以地区命名的江西诗派,公安、竟陵以及桐城,这些流派,是以文学上的共同主张,文字上的共同习尚相标榜。它们的出现,对于当时文学发展,是向前推进呢,还是阻碍其前进?起扩张作用,还是起局限作用?如果只是形成一种类似的文体、文风,则其价值就有限了。唐无流派,而诗的成就那样大,明清多流派,而文章越来越猥琐卑弱。看来,中国人,不习惯流派,我们封建观念重,一有流派,即易被认为门户,而门户对内是局限,对外是隔阂。

至于说学习、影响,那是另一回事,与流派无关,任何事

业,年轻的一代,总是要受前人的影响,或因为爱好,向某一位老的同行学习。文学究竟不同于演剧、绘画,即使是演剧、绘画,也要在同一流派之中,不断推陈出新,才能发展进步。在文学上,以一人之藩篱,囿自己之身手,虽中人不取,况作家乎?

风格的形成,包括两大要素,即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特征。时代特征的细节是:时代的思想主潮,时代的生活样式,时代的观念形态。作家特征的细节是:个人的生活经历,个人性格的特征,个人的艺术师承爱好。以上种种,都不是能强求一致,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的。所以说风格是不能模仿的。如只求其貌似,那只能对创作起束缚的作用。

文学的模仿,也是不可避免的,这只能说是学习阶段。应该很快从这种幼稚状态摆脱出来,发挥自己的特点,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因此,我对一些初期好像学习我后来离开我,另辟宽广途径的同志,总是抱鼓励的态度,并衷心感到高兴。任何事情,不能死心眼,抱住一个人或一种作品不放。我总是鼓励一些青年同志从我这里跳得更高一点,走得更远一点。这样才能使他们自己的作品,获得更多的生命的活力。

如果说流派,是只能从上面的原则,才能形成。因此,我对流派,也不抱虚无的态度。如果在我菲薄的才能之后,出现大材;如果在小溪之前,出现大流,而此大流,不忘涓涓之细,我就更感到高兴了。

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,一集中,一结为团体,就必然

分去很多精力,影响写作。散兵作战,深山野处,反倒容易出成果,这是历史充分证明过的。

问:您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?为什么?

答:现在想来,我最喜欢一篇题名《光荣》的小说。在这篇作品中,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。对于我,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,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。

问:您最初接触的是哪个作家的作品?喜欢阅读中外哪些作家的作品?它们对您艺术风格有无影响?

答:我第一次读到的“五四”以后的新的文学作品,是一本灰色封面,题名《隔膜》的短篇小说集。这是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丛书之一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但是,我忘记了它是叶绍钧一人的专集呢,还是几位作家的合集。这一本书,使我知道中国新的短篇小说的样式。

中外作家之中,我喜爱的太多了。举其对我的作品有明显影响者。短篇小说:普希金、契诃夫、鲁迅。长篇小说:曹雪芹、果戈理、屠格涅夫。

问:您的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、中篇小说《铁木前传》普遍受到称赞,可惜都是未完成之作,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?当初写“初记”、“前传”时,是否准备续写“后记”、“后传”?人们关心您是否打算续写《铁木后传》?

答:已经忘记,在写这两本书之前,是否有雄心壮志,要写几部几部。但确实因为没有全部完成,所以只好标题为“初记”和“前传”。实事求是地说,《风云初记》没有写完,是因为我才情有限,生活不足。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,不是越

写越散了吗？我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。《铁木前传》则是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，跌了一跤，随即得了一场大病，住疗养院二三年。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，草草结束了事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我家前后被抄六次，其中至少有三次，是借口查抄《铁木后传》的。造反派如此器重这部莫须有的文稿，使我一家人，百口莫辩。直到现在，我的书柜的抽屉还存在被铁器撬开的裂痕。这些人是为了判决我的罪名来找这部文稿的。在当时，一本“前传”，已经迫使我几乎丧生，全家惶惶。我想，如果我真的写出了“后传”，完成了它，得到了创作的满足，虽死无怨，早已经双手献出，何劳兴师动众呢？

现在大家关心这部“后传”，情况当然不同。但还是没有。对于热心的读者，很可能要成为我终身的憾事了。

问：您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它写出来呢？

答：我的想法是：在中国，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。人在青年，对待生活，充满热情、憧憬、幻想，他们所苦苦追求的，是没有实现的事物。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，是执着的，是如胶似漆的，赴汤蹈火的。待到晚年，艰辛历尽，风尘压身，回头一望，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，花残月落之感。我说得可能消极低沉了一些，缺乏热情，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，就写不成小说。

与其写不好，就不如不写。所以，《铁木后传》一书，是写不出来了。

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、杂文。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,不需要过多情感,靠理智就可以写成。青年人爱好文学,老年人爱好哲学。

问:平日写作之外,您作何消遣?

答:“文革”期间,我听过无数次对我的批判,都是不实或隔靴搔痒之词,很少能令人心服。惟有后期的一次会上,机关的革委会主任王君说:“这么多年,你生活上,花鸟虫鱼;作品里面,风花雪月。”

我当时听了,确实为之一惊。这算触及灵魂了吧?王君虽“主任”这一新闻机关的革命大权,但他是部队出身,为人直爽,能用十六个字,概括我的罪行,我想他不一定有这般能力,恐怕是他手下人替他总结出来的。

这是有踪影的判词。进城以后,街上繁华、混乱、嘈杂,我很少出门,就养些花儿草儿。病了以后,我的老伴,又陪我到鸟市,买了一个鸟笼,两只玉鸟。蝈蝈也养过,鱼也养过,也钓过。但所养的花,“文革”一开始,就都被别人搬走,鸟也不知去向,虫死鱼亡,几与主人共命。

我养什么也没有常性,也不钻研养法,也不吸取别人经验,又舍不得花很多钱,到终了什么也弄不出名堂来。

其实,写作本身,对我来说,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。我常常在感到寂寞、痛苦、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。我的很多作品,是在春节、假日、深夜写出来的。新写出来的文字,对我是一种安慰、同情和补偿。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,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。确实是这样,在创作中,我倾诉了心

中的郁积,倾注了真诚的感情,说出了真心的话。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,烽火遍地,严寒酷暑,缺吃少穿,跋涉攀登之时,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、鼓励、信心和动力。只有动乱的十年,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,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。

修补旧书,擦摩小玩意,也是我平日的一种消遣方法。

我不会养生之道,也不相信,单凭养而可以长生,按照我的身体素质,我已经活得够长了。我现在不大愿意回顾我年轻时代写的作品,偶然阅读一些,我常常感到害羞。在年轻时代,我说了多少过分热情的,过分坦率的,不易为人了解的,有些近于痴想梦呓的话语啊!

问:现在有人提出,文学(尤其是小说)的首要任务不是写人物,塑造典型性格,而是要着重表现人的感受、情绪,您怎样看这个问题?

问:现在一些作家,如王蒙等,在运用西方“意识流”等表现手法,对这种探索议论不一,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文学现象?

答:因为我有些想法,已经散见于我近日写的其他文章之中,此处从略。

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答讫

读 作 品 记^①

刘心武同志十月二十日来信：“今年《十月》第三期的小中篇《如意》，是我用力较多的一篇；另《新港》九月号上有我一篇《写在不谢的花瓣上》，也力图在写爱情上体现出我个人的观念，似与当前很多这方面的小说所表达的观念相悖，显得‘保守’……请浏览一下。”

我手下刊物已为别人拿去，从《新港》资料室借来，二十九日晚开始阅读，当晚读完《如意》，次日读《花瓣》毕。

关于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：

《如意》第一、二、三节，第八、九节。人物为石大爷（石义海）。

《花瓣》“十二年前的那个傍晚，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以下文字。

关于小说的不成功之处：

《如意》中写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部分。谁都知道，刘心武同志是以写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创伤成名的。他写《班主

① 《读作品记（一）》已以《读〈蒲柳人家〉》为题，收入《秀露集》。——编注

任》时,“四人帮”虽已揪出,但“文化大革命”仍当作正面的东西被歌颂。他首先在文艺创作上说出:这不是绣花布,这上面有苍蝇粪,有蛆虫,有更可怕的东西,在它的掩盖下面,……这是有功的,是一种创造。他的作品,是圣之时者,是应运而生的。

在我国历史上,作家也如同帝王将相,常常是应运而生的。当然也常常应运而死。远的不论,姑以近代为例:“五四”时代,左联时期,东北沦亡和抗日时期,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,“文化大革命”被歌颂和被诅咒时期。每个时期,都产生它的一批作家和作品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十年,实际上没有作家,在这种情况下,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作家。

《班主任》所写的是“雄鸡一唱”,但毕竟是在政治上打倒了“四人帮”以后,才能出现。而更早已经有街谈巷议,有反抗斗争。我们不能要求作家,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,写出这样的作品。政治总是走在前面的,“天下白”才有“雄鸡唱”。但如果老是写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那些游街、批斗、牛棚,这就又陷入了俗套。因为这些究竟还是表面的东西,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,是“四人帮”罪恶的类型性的表现。如果写,今天则须进一步,深挖一下:这场动乱究竟是在什么思想和心理状态下,在什么经济、政治情况下发动起来的?为什么它居然能造成举国若狂的局面?它利用了我们民族、人民群众的哪些弱点?它在每个人的历史、生活、心理状态上的不同反映,又是如何?但是,写出这些,就是在当

前也有困难,这需要政治上进一步的澄清,人民进一步的觉悟,需要时间的推移。

所以说,如果没有新意,可以去发掘别的地方,寻找新的矿藏。

我觉得作者能着眼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藏龙卧虎、人杰地灵的北京城,并发掘出石义海这样一个带有典型性的人物,是很好的一个转变。作家不能老注视一个地方,他的眼睛应该是深沉的,也应该是飞动的。石义海写得很好,我很喜欢这个人物。

《花瓣》中写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那一段,因为是通篇作品的主脉,是前面所抒发的感情的归结,与前面透露出来的一些轻浮的笔意作对比,它就更加成为凝重的、真实的了。

关于作者的文字及其表现能力:

我以为刘心武的文字表现能力,是强有力的。《班主任》初发表时,他的文字有些僵硬,有些新闻通讯的习惯用语。从现在这两篇作品,可以看出,作者在文字语言上,极力试探、突破,作了各种尝试和努力,获得很大的成功。他的文字的功力是很深的,语言具备敏感性,读书也多,这一切都会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
鲁迅说:“油滑是创作之大敌。”语言如果只求其流利通畅,玲珑剔透,不深加凝炼,则易流于油滑一途。外表好像才气洋溢,无所不包,实际是语言的浪费,对创作的损伤。《花瓣》一作,实有此苗头,不可长也。特别是写鄢迪那一段,给人以陈旧之感,这种写法,在十九世纪一些文人笔下,